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 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叶自成 庞 珣

【内容提要】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外交实践高度发展、各种外交思想流派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中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最高成就,与西方近现代才出现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当然也表现出中国独有的特色。本文试图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流派的外交思想进行分析,并与西方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对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思想达到的成就有一个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春秋战国;中国外交思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外交;现实主义外交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北京 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D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1)12-0024-06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的学人们总为中国没有像样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感到不安。中国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界在理论方面较为落后的状态与中国成长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实践进程很不相称。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借鉴西方国际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等,对中国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没有这一进程,没有对中国外交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外交思想史的全面的总结,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学理论。本文试从比较的角度对此作一初步的尝试。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与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可比性

人们通常认为1618~1648年西欧的三十年战争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但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

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国家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关于这一点,倒是一些西方学者比较谨慎,他们并不一定认为真正的国家体系在全世界都是从欧洲开始的,如通常被国内一些学人尊称为新现实主义大师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就说:“通常认为真正的国家出现于1648年这一事实,是‘仅就欧洲的国家体系而言’,并不适用于全世界,他甚至认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印度的考底利耶时期出现的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依旧惊人的保持未变’。”

尽管当时在中原大地上出现的华夏体系是在公元前770年到前221年间,但是,第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体系及其产生的外交思想具有早熟和惊人的现实性的特征,尤其是人文、社会、国际行为准则等方面,并不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失去价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4页。

值。正如另一位通常被一些国内学人尊称为西方现实主义大师的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所说:“一种政治理论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并不能得出它必然过时、陈腐的推断。”第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从西周衰弱、各独立主权国家产生、大国争霸到秦一统天下的大变局,这种“国际政治”的经历是一个历史的契机,这种历史的契机西方在几乎两千年之后才出现。外交思想各种流派的产生及其达到的思想高度是与当时丰富的外交实践紧密联系的。第三,这一时期,中国在500年间经历了多极格局、两极格局、无序状态和单极霸权格局等等,外交思想能够发展的土壤非常肥沃,因而不但能够产生各种流派,而且不少外交思想的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还应当注意到,西方近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虽然有不同的缘起,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学者总结和分析西方的历史(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欧洲的历史)有密切联系的,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就是研究国家间历史的科学,甚至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称为国际政治学的最伟大的先驱,他的《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是两千年来分析国际关系的三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而实际上,《春秋左传》、《管子》等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史的杰作,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国内不少学者谈到地缘政治思想时都认为起源于西方,而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却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的地缘战略思想很丰富,并引用《孙子》中的“衢地”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

当然,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许多东西是不可比的,如西方国家之间的平等观念、神权观念和教会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国家间法律意识等与中国大不相同,但就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要研究的本质概念,如国家、主权、外交战略和策略、国家权力、国家利益等观念而言,就它们观察问题的主要方法,如认为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或者性本恶的现实主义对国内政治、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言,就它们的思考所达成的最后结论和思想如权力均衡(合纵连横)、霸权秩序、干涉主义或者国家独立、消灭战争维护和平等而言,两者所涉及的内容又是同质的,是完全可以进行比较的。

春秋时期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及流派

春秋时期占主流的外交思想,可以用现代的术语概括为是理想主义,其主要特点是用某种公认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来规范当时的国家的行为。虽然国家自身利益的追求已经对各国间的交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形成的一些观念,如遵守和维护周朝的礼义秩序,以“礼”来规范国家往来的行为,保护华夏地区的国家不受蛮狄夷戎的侵犯等,对当时的各国还是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和约束力。这一时期人们认为,“礼,经国

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礼,王之大经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生也”。总之,礼是个人和国家不可违反的行为规则,各国都必须考虑和费心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礼”性。当“礼”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许多时候国家利益还是要受到礼的约束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春秋时期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各种流派。

1. 理想主义霸权学派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等人。管仲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使齐国强大起来,成为春秋首霸,开创了霸权时代。在齐国霸权下,春秋有2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尽管《管子》一书中包含了许多现实主义的元素,但它的主流和核心是理想主义的。

管仲认为,维护周朝这个“联合国”的秩序是齐国作为霸权国应该承担的最大、最高的国际义务。在齐桓公执政时,齐国召集了九次会盟,大多是以仁义为旗号,以维护周礼为号召,组织多国军队对“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进行征讨。盟主处理与体系中的各国关系的原则主要是:亲近有礼的国家,依靠稳固的国家,离间叛乱的国家,颠覆覆乱的国家,要“仁以天下,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在“周礼”的框架之内,齐国承担“超级大国”的义务,尽到做盟主的责任。齐桓公帮助鲁国平定庆父之乱,助邢国抵御狄人入侵,镇压一些不守周礼的国家,但又不据其土地为己有,带领诸侯国修筑要塞,防范夷狄,保卫体系内各国的安全。

实现管仲维护周朝秩序的理想,齐国就能够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充当霸主。没有齐国的国富兵强,霸主地位就岌岌可危,更谈不上去维护周礼了。“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治天下有分。”

值得一提的是,管仲在对国家势力的评价中把国民的精神状态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决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讨论了富国强兵的途径,是国家安定的措施,一国的硬权力(即经济、军事的力量)和软权力(国民精神和国际威望)的相互关系,希望把齐国建设成一个国富民强、以德服人、不恃强凌弱惹是生非又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的霸主国家。

管子的霸权-秩序的思想,与现代流行的霸权和平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通过自我限制地使用实力,其影响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并且可以建立和维护国际体制,使整个国际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5页。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译林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3页。

《春秋左传》,鲁开泰译注,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58、929等页。

《管子·形式解》第64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91页。

社会处于和平和正常的秩序之中。这个理论发展到现在,又出现“单极稳定论”。威廉·沃尔弗斯在《单极世界》里认为,单极霸权国的介入对体系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它的角色越有效,国际体系就越持久。管子的思想与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认为某种形式的霸权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益的,都认为霸权可以带来秩序,主张用建立霸权的方法来保证国际社会的良好运行。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管子的霸权思想是在理想主义的框架下,主张用霸权来实现“周礼”规范的国际社会,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色彩,他不是在为霸权找合理性,而是为国际秩序找保证的方法。

2. 理想主义仁义学派

这一派主要以孔孟为代表。孔子的外交哲学思想,就是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其中包含了孔孟学派观察社会、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从人性出发、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然后扩大到社会和国家间关系。

孔子外交哲学的基础是信义。在孔子的观念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因而也应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原则。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为政第二》)儒家信奉的真理就是“诚者,天之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化”。由于对信义诚实的高度强调,所以在外交领域也是不能例外的。信义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国的立国之本。

追求和平是孔子外交哲学的理想。儒家学术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平安是任何一种存在的理想状态的追求,自然也是国家之间相处的至高境界。因此,孔子厌恶战争和暴力。

首先,要达到“和”就要靠“礼”,要以完美的行为准则为指导。“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礼”的具体要求。礼的根本是“仁”,只要在这个准则之下,紧抓“仁”的精髓,天下就太平了。

其次,要“和”就必须提倡“中庸之道”。国家的行为要把握分寸,不偏不倚,持中道,可以“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提倡中庸之道,也是提倡国家之间要互谅互让,以宽容忍让的态度,公正平和地解决问题,排除战争的危险。

追求各国在周礼基础上的大一统是孔子的外交理想。孔子极其推崇周礼。在他的思想中一个由天子统治下的恪守周礼的社会是完美的社会。因此,孔子从实际能力出发,在文化教育上走一条天下主义的道路,想为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理想作出贡献。

孔子的儒家外交思想还肯定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思想的推演就是对霸权体系和强权政治的反对。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总之,孔子的理想主义仁义外交哲学是以建立周礼为准则

的国际秩序,是以“和”为理想状态,以“仁”、“信”、“义”为价值标准的。

以浓厚的价值观作为国际交往和外交行为的准则,在西方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中都不乏与孔子持一定程度相同信念的呼应者。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理想主义的创始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力图在他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在威尔逊的理论中,价值的追求是国家行为的目标,一定的原则是要属于世界并由全世界来维护。“这些原则属于获得了自由的整个人类……所有国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各自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拥有同等的利益,都同样有责任对这两者加以维护”。

孟子作为后世儒家尊称的“亚圣”,不但在思想上继承了孔子的精神,而且有其独特的发展。孟子的外交思想带有更为强烈的“天下主义”色彩,包含干涉主义的基本因素。

“仁义”是孟子外交哲学的最核心概念。孟子论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理想的关系。由于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国家之间就会无休止地争斗,战争就不会停止。这样,孟子找到的天下混乱的原因就是国家对狭隘利益的追逐,而利益是不能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以仁义的理想代替之,可以使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化,培养向善的追求,善意待人。从个人推及国家,国家就有了崇高的追求。

从仁义的信念出发,孟子主张以行“王道”来实现国家利益。孟子认为真正能让天下归附的是以仁政服人、以德利天下。而以力服人的“霸道”,用仁政做幌子是不能长久的。行仁义,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仁政无敌”,“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同时,仁义也是孟子的国际秩序的理想。孟子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义大行的社会。国与国之间推行仁义的精神,可以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中至为重要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各国之间应该彼此怀着“仁义”之心,大国为小国服务,小国也为大国效劳,天下就太平了,大国小国就各得其所了。由于“仁义”而非“和”是孟子的终极理想,所以孟子对反对不仁义、重建仁义而进行的战争是持赞同的态度的。

王在邦:《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考察》,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绪论部分。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来可鸿撰:《大学·中庸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来可鸿撰:《大学·中庸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李剑鸣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孟子》,李双译注,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56页。

孟子的干涉主义也是与他的“仁义”的追求和信念紧密联系的。由于“仁义”是普天之下应该遵循的准则,那么,一国要是违反这个原则,别国就有权干涉。“仁义”不仅是高于国家利益的,而且是超越国家界限的。“仁义”是判断一切的标准,是合乎人性与理性的唯一源泉。由于仁义是孟子看问题的立足点,所以孟子认为,在天下当仁义面临被践踏的危险时,行仁义的大国应当出来维护和推行仁义。在这个前提下,仁义的大国可以在别国人民的支持下对那些被公认为践踏仁义准则的暴君兴义师攻之,解救他国人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干涉主义与当今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人道主义干涉是从非政治立场出发,为终止一国国内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未经该国许可,而运用强制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的一种干涉。当国际社会确认某个国家的确存在严重违反国际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如南非白人政权对黑人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这种干涉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孟子主张的仁义,还是现代西方干涉主义的基本人权,二者都认为存在有某种不分国家和民族、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被破坏。如果这一原则被破坏,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霸权国或领导国就有义务进行干涉。这种理论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同的是,孟子的干涉主义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或仁义价值观念的,而当代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则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大国利己主义、大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混合物。在考虑干涉的时候,干涉国并不是真正从理想出发,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利益是唯一的指南”,“判断是否要进行干涉,必须保证使用武力与其他方式所获得的利益相当。”所以,西方的新干涉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强权政治,把本国利益置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上。

3. 理想主义自然学派

这一学派以老庄为代表。“道”是老子思想的出发点。“道”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总规律。“道”的特点是“静”、“无”、“常”,顺乎自然是道的要求。这也适用于国家间交往的领域。

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应该“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

但是,老子又同时反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国际秩序观,因为它们同样是反自然的,是人们要“有所为”。人们要去追求仁义道德,结果就是背弃了“道”本来已设定的最佳秩序,那么祸害也就滚滚而来了。

但老子并不赞成后来被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暴力竞争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无为和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国际社会应该是有秩序的,但是这个秩序不是由某些大国通过强力去建立的,而是要在无为中达

到和谐,在无序中达到有序。那到底应该怎样无为呢?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上,老子认为大国与小国彼此都谦让一点,大小国之间有了信任,就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各安其位,和平相处了。在老子的理想中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应该是在这一个已失去了“道”的秩序的现实中暂时的关系。老子的外交思想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和平观。因为老子信奉“道”这一总规律的永恒存在,因此,和平不是人去建设的,而是天定的。人反自然去“作为”,终将破坏自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必要去刻意地追求不平等,只要自然地和谐相处就行了。和谐是老子外交哲学的最高理想。老子认为,大国与小国的区分,国家间的交往会破坏和谐而引起纠纷和冲突,世界会因此而永无宁日。小国寡民的社会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某种自然的和谐。

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

在春秋时期,理论上孟子、管子的外交思想里已经有现实主义的成分,而在实践中,以郑国大夫子产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已经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产生了军事威慑、均势政策、提高国家实力、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吴越争霸使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走到了极端。

到了战国时期,东周一统天下从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形式的瓦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礼”的概念重要性下降,各国行为的合理性、正义性不再有公认的评判标准,甚至它们本身都不再重要。各国公开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残酷激烈的竞争中利用一切手段和条件保存和发展自己。各国纷纷改革以发展国力。春秋时期就已经萌芽的“国家利益”的观念进一步发展。同时,战国时期,外交对一国生存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提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许多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家。他们中较有特色和影响的有以下几派:

1. 文仲、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学派

由于文仲、范蠡是在越国面临亡国命运的时候登上政治舞台,为越国的振兴和战胜吴国而提出外交理论的,因而他们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

他们崇尚国家实力,认为国家的命运要由实力来决定,国家要根据实力来行动。文仲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也。天谋必素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文仲认为在国力不强时要学会忍辱负重,关键在于增强国力,再以图后计。

由此,他们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并利用国际矛盾,来保

Stanley Hoffmann et al.,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 p. 8.

[美]理查德·N. 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美]理查德·N. 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沙少海等著:《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存自己、削弱敌人。范蠡在看到吴楚结仇时,对勾践说:“臣愿大王匿声,不见其动,以观其静。”当时吴国国力正强,势头正盛,是吴国称霸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越国不能轻举妄动,而应该利用矛盾,等待时机。

在战术上,他们提出了一整套外交策略,这个策略的唯一目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完全可以不考虑道德上的问题。文仲强调要增加越国国家力量时,也力图和平演变吴国,总结出了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起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谏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富而备其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在这九条里,第二条到第七条提出的谋术完全是历代政治家行而不宣的东西。在实践中越国也毫不顾及道德的限制,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能说出口和不能说出口的方法一一采用,一一实行。他们是彻底的目的论者。

文仲、范蠡的外交思想和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曾有一本专门的著述《君主论》来阐述他的超道德的政治理论(包括内政的和外交的)。里面也有像文仲的“九术”那样的、充满了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他完全不反对以罪恶的方式达到政治的目的,相反,他竟然认为“加害于人一定要一次完成的;……给人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来,这样人们更能感受到恩惠的好处”。文仲、范蠡和马基雅维利都倡导超越道德的政治。《君主论》从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都在论述君王道德与个人道德的不一样。因为他和文仲、范蠡关注的并非一般人的活动,而是在阐述“有关伟大人物的那些知识”。他们基于共同的认识:“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就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和介意。”而不耻于宣扬和实行诈术。他们都是目的论者,只是“力求说明为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这样的学说合道德性似乎会带来国际关系的凶险,不应该进行宣扬。但是,应注意他们的背景都是特殊的。文仲、范蠡完全是在越国亡国的情况下提出他们的理论的;而马基雅维利所生活的意大利,“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破败不堪的状态中”。两者的情况都是“危机存亡之秋的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别人有正义行为的”。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

2.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

苏秦、张仪都师从于鬼谷子门下。鬼谷子的谋略思想对他们两人的影响很大。苏秦、张仪都认为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外交谋略是极其重要的,有时,它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鬼谷子的谋略思想是纵横外交战略学说的哲学基础。鬼谷子的谋略学说的思想精神就是强调在实力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决定事情的成败,认为善于观察思考,找出妥善的谋略,抓住时机,决定利益的取舍,选择利益之所在,就能够发挥长

处,补足短处。

张仪是连横战略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张仪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思想。张仪强调综合国力在外交中的绝对重要性,成为他连横战略合理性的基础。所谓“综合国力”不是单指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的修明、国家的凝聚力、政策的正确性等等因素。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就不怕别国实行合纵战略。因为,国家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

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仍然是不够的。张仪同时认为,一个大国要想有大的作为,就必须重视外交。外交策略的正确与否,可以决定一国是抓住时机还是错过良机。张仪认为,当时秦国以如此强大的实力竟然迟迟没有能够称霸,主要就在于秦国没有一个好的外交谋略。

张仪对地缘政治也相当重视。他分析了赵国的地理位置是“中央之国”,又同时是秦国的邻国,对于秦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他还具体分析了秦国如果征服灭亡了赵国会在地缘位置上获得的好处,如果赵国被其他强敌占据,秦国会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

张仪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破除对付秦国的合纵战略。他提出要利用矛盾,使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各国的联盟。张仪本人完全不顾道德信义的束缚,积极大胆地开展破除合纵的外交活动,采取大量欺诈的手段达到外交的目的。

苏秦也曾经向秦国提出过连横的建议。由于秦惠王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后来他主张其他各国联合反秦的合纵战略。苏秦也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实践,并开创了穿梭外交和间谍外交的先例。在外交理论上,他的贡献之一是他不仅提出了“外交”的概念,而且直接把一个国家的安危与外交联系在一起,认为外交是关系一国根本利益的大事,绝对不可忽视。

苏秦以合纵战略作为其外交主张的核心。这一战略是要以外交的手段联合数个力量相对弱一点的国家,以外交联合的方法来改变实力对比,保存各国实力。

此外,苏秦还有大量的精辟的外交思想。如,不称帝、不当头的思想,因为当头称帝会招来其他国家的嫉恨,如果不称帝则会得到人心。一个国家不能够贪图虚荣而不慎成为众矢之的,带来很大的麻烦。苏秦还认为,“权籍”与“时势”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一个国家正确的国际定位应该和它的实力和民心相适应。实力和国际形势是国家外交的关键和核心。在国家力量不够、国际环境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契机的情况之下,

《越绝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67页。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3~84页。

国家想强要出头只有害处。一切必须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苏秦还提倡后发制人,不能轻举妄动,要学会等待时机。尤其是在国际形势比较复杂、实力对比优劣不太明显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贸然打破均势,要借别人的力量去变化时局,自己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行动,后发制人。另外,苏秦认为外交解决问题比武力更为可取——“战攻非所先”。苏秦认为应坚持不首先发动战争的原则。战争是一种灾难,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先发动战争必然带来不好的后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来实现,那么就不应该以战争作为手段。但是,与理想主义的反战不一样,苏秦是由于看到战争较之外交的和平方式是较差的实现国家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因此反对战争,而不是处于道德上的关怀。

苏秦、张仪各自的合纵、连横战略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均势政策,而他们两人也是中国古代的均势大师。在战国时期,整个局势呈一超多强的格局。苏秦的合纵思想就是要联合六国以与秦国抗衡,建立起一种力量平衡,以此来求得六国的安全。而张仪则要以连横的战略力求打破这种均势,使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他们的结盟与反结盟的措施实际上都是要建立均势和打破均势,因此说他们是均势策略的大师。在西方,“均势学说是国际政治学说中最古老、最持久和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早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像一个国际间谍一样进行过穿梭外交,最后其达到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波斯对古希腊的一贯的均势政策说服波斯皇帝帮助当时情况较为不利的雅典。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追求欧洲大陆的均势平衡,现代的均势大师亨利·基辛格不但在政治活动中贯彻均势的思想,而且有大量的理论上的论述。东西方的均势政策都“既要求联合敌人的敌人,也需要掣肘自己的盟国和朋友,如果后者的举止可能打乱既有的微妙的平衡的话”。

3. 韩非子的权力学说

韩非子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性好利本身并没有错,只要利用得当,反而是一件好事。利益是人们活动的出发点,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可以无所不为。人类社会所有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说到底,仍不过是由于利益不同而进行的利益争夺。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利益的争夺中获得胜利呢?韩非子认为“力”是最重要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他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国际环境,指出“当今争于力”,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没有实力就不可能生存,不可能称霸。

以实力求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但是,国家应该怎样做呢?韩非子认为增强实力是根本之道。实力是一个包含甚广、内容甚丰的概念。韩非子的“实力”除了国富民强外,还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力和国家的凝聚力也很重要。在谈到怎样增强国家实力的时候,韩非子特别强调“法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好的办法和最可靠的保障就是“法治”。

除了法治,权力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法治没有权力作为后盾是难以实施的。当今的时代处于“大世之争”,没有足够的权力是无法实现利益的。韩非子认为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君主除了掌握实权外,还要控制看不见的权力,从思想上也要做到高度集中,实行绝对的集权,“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通过集权达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主张以实力实现外交目的和国家利益,因此,对于外交谋略本身的作用并不看好。而且,韩非子时代的国际形势因为秦国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外交谋略再也不像苏秦、张仪时代那样可以有所建树了。韩非子最为笃信的是权力,因此,他不但对仁义礼治的理想持批评态度,同时也强烈反对当时的纵横家的主张。“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诸侯言纵者曰‘纵者必霸’,而言横者曰‘横者必王’,山东之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为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止五霸不待纵横,察治内所以裁外而已矣”。

通过以上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探讨总结,并与西方的外交思想进行的简略的比较,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经历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国际社会,而且,这一国际社会关系丰富多彩而复杂多变,中国在当时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相当价值的流派众多的外交思想。这些外交思想,无论是就其讨论还是关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由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共性和历史发展契机和经历的某些相似性,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来的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西方外交理论的许多思想内核是如此地契合。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让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很多问题。当然,由于东西方的文化、思维方式固有的差别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还有时代上不可忽视的差距,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突出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性格特点,也是更为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地方。

[收稿日期:2001-09-13]

[修回日期:2001-10-25]

[责任编辑:谭秀英]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94~604页。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

(清)王先慎、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9页。